

紀念羅君惕先生

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史佩信

主編

余穎

副主編

上海教育出版

紀念羅君惕先生

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史佩信 主編

余穎 副主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紀念羅君惕先生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史佩信主編.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44-7015-5

I. ①紀… II. ①史… III. ①漢語—語言學—文集②
漢字—文字學—文集 IV. ①H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93495 號



責任編輯 周典富
封面設計 鄭藝

紀念羅君惕先生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史佩信 主編 余穎 副主編

出版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網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號
郵 編 200031
印 刷 上海葉大印務發展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1/32 印張 11.25 插頁 3
字 數 29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4-7015-5/G·5775
定 價 80.00 元

如發現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本社調換 電話: 021-64377165

憶羅君惕師

(代序)

史佩信

前些天，滬上知名文化學者錢漢東先生來電告知，先師羅公君惕的著作《說文解字探原》已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今年適逢我校建校六十周年大慶，總共 230 萬字的煌煌巨著，可以說是凝聚先師畢生心血的《說文解字探原》一書的問世，無疑給校慶獻上了一份隆重的厚禮。

羅師仙逝已有整整三十年了。那是 1984 年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個寒夜，距他招收的最後一屆研究生進校才剛剛半年。其實，那時他已經年屆八十，完全可以不用再為教學工作操心，完全可以居家頤養天年，安享清福了。然而當時“文革”結束不久，人才緊缺。羅師不顧年邁體弱，不僅熱情帶教研究生，而且還乘坐公共汽車來校為 77 級和 78 級本科生開設“古文字學”選修課。因為選修的人多，選修課就放在可以坐一百多個學生的大教室裡。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在這樣一個大教室裡講課所要付出的精力。對於培養後一代的教育事業來說，羅師是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羅君惕師(1905—1984)是蒙古族人，本姓那，出生於江蘇鎮江。8 歲起從父讀書寫字，進而學金石古籀篆隸，又學舊體詩與山水畫，從小打下深厚的國學根底。長大後又結識了吳昌碩、潘天壽

等南北書畫名家與文字學家，並潛心研究石鼓文，新中國成立前就撰寫出版了《秦刻十碣考釋》一書。後歷任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大學前身）等院校教授，還曾當選為上海市政協常委和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230 萬字的《說文解字探原》，分為十大冊，花費了羅師四十餘年的精力，是他一生的代表作。這本書用甲骨文梳理了《說文》的源頭，糾正了許慎《說文》一書不少錯誤的解釋，在古文字學和《說文》學領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次中華書局出版《說文解字探原》一書，對我們上師大、人文學院和中文系的學術研究和發展來說，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喜事。

我讀本科時選修了一個學期羅師的“古文字學”，讀研時又聆聽了羅師一個學期的“說文解字”教學，和羅師接觸的時間其實並不算很久。不過，羅師對我的影響卻是難以估量的。羅師不僅向我們傳授專業知識，更注重培養我們治學態度和方法。羅師有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那就是“讀書得間”四個字。

人生一輩子，直接從老師那兒得到的知識畢竟是有限的，主要還是靠自學，靠自己讀書。“讀書得間”，這個“得間”，就是指發現問題，就是說，讀書要讀出問題來，才算有效果。有些人讀書，讀了半天，什麼問題都沒有，好像什麼都懂了，其實他是根本沒讀進去。祇有鑽研進去了，才會發現問題。根據我的體會，這個“得間”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發現自己的問題，書本沒有錯，這裡所謂的“問題”，是自身的問題，是自己的不足；另一類則是發現書本的問題，確實是前人說錯了。不管哪一種“得間”，對讀書的人來說，都是一種進步，一種自身素養的提高。而隨著學術的積累，後一類“得間”就會逐漸增加，這樣就有可能在學術

上有所創新。

師大建校六十年來，湧現了許多像羅師這樣富有人格魅力的老師。這些老師也許性格脾氣迥異，學術造詣不等，但是在他們身上卻有著一個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對教育事業的摯愛和對後輩學生的關懷。數十年漫長歲月的流逝，可以侵蝕掉世上許許多多的東西。但是這些老師的人格魅力以及對自己事業的執著的熱愛，在學生的記憶中是永遠不會磨滅的，並且一代一代薪火相傳，進而成為我們師大的一種優良的傳統。

原載《上海師大報》358 期（2014 年 3 月 30 日）

目 錄

高山景行

羅君惕自傳	羅君惕	3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羅君惕	11
天干地支之起源與作用	羅君惕	14
我對改革漢字的意見	羅君惕	32
回憶父親羅君惕	羅胤生	39
羅君惕與《說文解字探原》	錢漢東	42
《說文解字探原》出版始末	朱兆虎	46

箕裘相繼

《說文解字》部首系聯的種類及原則	左思民	53
“亞”字研究	劉民鋼	61
先秦出土文獻語料分析研究的意義價值	劉志基	68
《說文解字》中含“竹”部件字的研究	金玲利	84
由“歎”而發 ——淺析“𦵏”作偏旁構形的省聲字	李 燕	96
文獻用字層面的秦楚簡文構形差異比較研究	樓 蘭	104
試論“魚鼎匕”及其銘文的若干問題	沈之傑	114
釋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出土陶文“容”字與說古文字中 的“𠂔”字及相關之字	謝明文	131
魏晉南北朝石刻新造字研究	郭 瑞	146

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用字考	徐時儀	潘牧天	157
類型學視野中的自源文字研究芻議	朱建軍		185
論漢字繁化現象的文字學意義	楊旒		194
成語“飛蛾撲火”的語源和流變	陳秀蘭	朱慶之	211
柱斧爲儀仗器考			
——兼論“宋揮玉斧”與“斧聲燭影”	胡紹文		226
《燕山外史》文本中“字形表意”與“字形對稱”現象初探			
——兼談《燕山外史》繁簡轉化中應該注意的一類問題	周黎敏	王莉瑞	238
《燕山外史》兩個簡體字版的校對	趙姚娜	石小瑋	258
《左傳》揚晉文抑齊桓析	翁其斌		282
《容齋隨筆》詞語考釋	凌英		294
《賓退錄》在語詞訓詁方面的價值	朱春雨		307
談“差點兒(沒)VP”句式的缺位問題			
——兼論判別預設與斷言的方法	史佩信		321
《戰國策》中假設連詞“今”淺析	余穎		340
後記	史佩信		352

高山景行

探原索引盡移山精力結成民族交融瑰寶
鉤玄發微傾畢生心血催開漢字文化奇葩

這一部分呈現的是羅君惕先生與他的《說文解字探原》。

首先是羅先生於1980年撰寫的自傳和三篇遺文。前兩篇是羅先生當年講課的講稿內容。兩年前，羅先生次子羅胤生先生向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捐贈了一批羅先生的紀念物，我們從其中的鉛印講義中選取了兩篇未公開發表的文章，錄入電腦，收入論文集。第一篇《漢太尉祭酒許慎記》著重於注釋。第二篇《天干地支之起源與作用》是羅先生對10個天干字和12個地支字的完整梳理。第三篇《我對改革漢字的意見》是陳五雲教授根據羅君惕先生早年的手稿照片整理而成，主要內容是羅先生對文字改革的一些看法，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學者對文字改革的普遍思考。這部分照片共36張，由羅胤生於2017年4月提供。

其次是羅先生親屬和學生撰寫的紀念文章，分別講述了兒子眼中的父親和學生眼中的先生。

最後是中華書局的編輯，也是《說文解字探原》的責任編輯撰寫的出版始末，介紹了《說文解字探原》書稿的發現和出版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以及相關的對策和解決方案。

羅君惕自傳

羅君惕，別號艮厂，蒙古族，屬巴岳特部鑲黃旗，本姓那。於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生於江蘇省鎮江市。祖父名惠元，字子錢，為京口駐防軍左翼協領兼護理都統。辛亥革命時，祖父弃官避難泰州市，改姓羅。父名承謨，字紹錢，為秀才，善書法。我自八歲起，即從父讀書寫字，依次臨摹顏真卿、柳公權、蘇軾諸大家之字帖。年十五，入泰州淮東中學肄業，進而學金石古籀篆隸，又學為舊體詩與山水畫，頗得老輩稱許。年十九，入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商科肄業，課餘仍自學金石詩詞書畫。其時，由友介紹從江陰曾家達先生學詩詞，又由曾先生介紹得見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先生。大學畢業，獲商學士學位，失業家居。年二十一，娶妻張雯岫，為大姑母之長女，亦蒙古族，屬札魯特部。

年二十五，前中國公學教授黎照寰先生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召我為文書主任，凡十二年。其時，先後加入上海中國畫會與北京考古學社，遂得交南北書畫家與文字學家。中國公學董事有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諸氏，而于氏以書法名海內，我曾以所書鐘鼎文請教於于氏，于氏掀髯點首言：“近二十年來無此作也。”（二十年指中華民國成立二十年）上海書畫家馬公愚嘗遺書與我，謂：“公之書溫穆雅馴，弟傾服已久矣。”其後曾以書畫各一幅，參加日本東京書畫展覽會。我於大篆，頗喜秦刻十碣文。十碣文舊稱石鼓文，向來皆斷為周宣王大蒐岐陽之文字。自宋代起，始有謂秦代刻石者，如鄭樵謂在秦惠文之後，始皇之前；鞏豐謂在秦獻公之前，襄公之後；震鈞、馬叙倫均謂在秦文公之時；郭沫若謂在秦襄公之時；馬衡謂在秦穆公之時。我則同於鄭氏之說。曾以十碣文與籀文、大篆（即詛楚文、盂和鐘、秦公簋）、小篆（即秦始皇、二世之刻

石如嶧山碑、會稽刻石、琅琊刻石，權量詔書及《說文解字》）比較，其結體與籀文同者八十三，與大篆、秦刻石同者六十一，與許書同者則有一百一，但其文之字體圓扁，與籀文、小篆迥異，而與大篆則全同；其文之結體比較簡易，與籀文多異，與大篆、小篆則多同。詛楚文、盂和鐘、秦公簋皆秦惠文以後，始皇以前之物，是以知之。若其詩則佚詩也，因此曾撰《秦刻十碣考釋》一稿，曾將《時代考》一篇於1935年刊登於《考古》期刊第三期（容庚主編）。任職餘暇，除撰述外，仍自修舊業，又閱讀五經諸子。於是發生兩個問題，即：自古文、籀文而至行書、草書，字體迥殊，此何由而變？字書所載字義與諸家所注經子，其解釋亦有不同，又何由而變？我百思不得其解，而欲問亦無從。最後以爲非研究文字學不得解決。此我從事文字學之動機也。

欲知字體字義之變，當研究文字學，然欲研究文字學，又當讀何書乎？曾讀《隋書·經籍志》，彼謂文字學當包括形體、意義、聲音三方面是也。今所存最古之字書而包括此三方面者，惟東漢許慎所撰之《說文解字》而已，乃取而讀之。初並句讀亦有不知，疑惑更多不解。於是又取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桂馥之《說文義證》、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王筠之《說文句讀》而讀之，後又泛覽各家之書，有必要則記之。其所記者有五：一，許氏說解之謬誤者；二，我所不知而各家均未論及仍不能解決者；三，各家有獨到之見解者；四，各家所說不同而未能斷其是非者；五，自己之心得體會。如此者四年，所獲較多，始有撰稿之意，但其書名與體例均未能定也。凡四易稿，始定名爲《說文解字探原》（以下簡稱《探原》），而其體例則悉依《說文解字》，首列字形，次釋字義，次定字音。故《探原》亦首以其所列篆書與古代文字如甲骨文、鐘鼎文、大篆以至隸書等相比較，而分出正字、或體、譌字與簡字；次以正字與字書、詞書、韻書以及經籍、子史、文集等等注釋相比較，而分出本義與後起之義或誤解等；次以本義與字書、詞書、韻書、毛詩、《楚辭》以及漢魏晉時代之韻文所注之音相比較，說明其字從某字得聲

之理由，而分出古音、近音或誤讀。凡關於字體者，以甲骨文爲第一類，金文屬第二類，石文爲第三類，餘者爲第四類；凡詞於字義、字音者，以字書、詞書、韻書爲第一類，五經爲第二類，諸子爲第三類，群史爲第四類，各家文集爲第五類，餘者爲第六類。後人著作，各以類從。文史兩類，苟非必需，皆斷自漢代。此外，凡形聲、表聲之字必兼表意，故許慎有“亦聲”之解，宋朝王聖美有“右文”之說，鄭樵亦有“聲兼義”之論，但均未悉言之。此稿則詳加稽詮，務儘獲其兼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其後四年，此稿方撰至“言”部，我被迫內遷。乃自上海至金華，在日寇轟炸之下，隨東南聯合大學籌備委員會西至福建建陽。彼會主任何炳松聘我爲秘書兼先修班國文教員。越年，又聘我兼任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遂獲交大畫家潘天壽，常合作書畫，均爲同事奪去，而著作之事乃暫停。1942年8月，我又調任浙江英士大學國文教授兼校長室秘書。英士大學設在泰順，有美術科，潘天壽教國畫，我教詩詞書法。1946年11月，我復員回上海交通大學，力辭其他職務，專任國文教授，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國文教授，餘暇仍繼續撰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不教國文一科，改教新文學。1951年實行院系調整。交通大學廢除語文課，我被調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1953年4月，由政務院任命爲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1954年7月，當選爲上海市第一屆人大代表。同年10月，又調任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以迄於今。1955年5月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10月，被選爲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代表，與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教授吳文祺同赴北京出席。其後，在院外則經常參加政治學習與政治活動；在院內，我雖無課可開，亦須每日到院上班，於是撰述之事祇能於假日從事。1956年7月，被選赴東北參觀，先至北京，曾獲毛主席接見。9月，當選爲上海語文學會理事。1958年8月，講授古漢語語法與文字

學基本知識。但至 1959 年，掀起教學改革高潮，兩課又告停止。1961 年，加入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展覽時，馬公愚與諸老書畫家均謂：“篆書當讓老羅。”是年 9 月，被選赴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又獲毛主席接見，人以爲榮。

教學改革高潮過後，又重開文字學。在講授後，漢語教研組同事要求我將所講之內容寫成一部講義。所謂內容，即文字學之基本知識。因此，遂又抽出時間編著，閱二年而成，名爲《中國漢文字和漢文字學的源流》（以下簡稱《源流》）。此稿首先討論五大問題：一爲先期文字發展至正式文字之幾個階段；二爲文字創造之人，在原始社會時爲勞動人民，在階級社會時爲知識分子；三爲文字產生之時代當在原始社會後期；四爲文字發展規律，即從表形而至表意、表聲；五爲文字構造方法，即古之“六書”，其名稱與次序當爲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所謂轉注，實與形聲相同，但形聲之形旁不省，聲旁則或省或不省；而轉注之形旁必省，聲旁亦或省或不省耳。以下則先述先期文字之結繩、八卦（按照《周易·繫辭》與孔安國《尚書序》所言，應爲結繩在先，八卦在後；許慎《說文解字叙》則以八卦在先，結繩在後，實誤），以至正式文字之古文（甲骨文）、籀文（鐘鼎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各種字體與古籀篆隸楷之簡體及象形、指事、會意字之聲符，然後再述歷代字書、詞書、韻書以及研究各種字體之專著，除扼要介紹外，更指出其得失之所在。全稿約二十萬字，分兩大冊完成後，曾與上海出版社聯繫，以其不在出版範圍內，謝不接受，遂束之高閣，仍繼續撰述《探原》。

1966 年 5 月，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各高等院校學生均組織紅衛兵。其時，我院學生有三千餘人，中文系最多，有一千餘人。其中有八百餘人組織紅衛兵，屬上海紅衛兵高等院校革命委員會。此會對老年教師之無政治、歷史問題者，皆認爲有思想意識問題，俟日後進行批判，故我未被揪鬥，更未入“牛棚”，人以爲奇跡。我輩每日上午到校學習文件，若無其他集會，即各自回家。於是我每

日下午至晚間，可撰述八小時，可探討八個字，工作極為迅速，越一年餘，張春橋已奪得上海領導權，開始向老年教師進攻。先迫令我輩將所謂“黑稿”（即各人之著作稿本）交出，幸管理之人皆我教過之學生，未加毀損。我雖為漏網之魚，然亦在排斥之列。自此每日到校上班，非學習文件，即開會討論或批判所謂“走資派”，而撰述時間，又祇有晚間與假日矣。至1969年10月，上海各高等院校之師生員工均下鄉勞動，我院派在松江佘山公社。每日或學習文件，或開會批判，或參加勞動。我時已六十餘歲，夏則烈日灼膚，冬則寒風刺骨，亦不得免。惟每兩星期可返滬一次，休息二日，我僅有此時從事撰述。至1970年7月，始全部撤回各院校。或勸我上課，我謝絕。1971年2月，我被派去參加標點《宋史》，其中最難之《禮志》《樂志》《律曆志》等篇均由我任之。但主其事者乃一不學無術之徒，不明古文之義，不知標點用法，妄自改易，錯誤百出。我力爭不得，乃憤而告退，又不許。此正“四人幫”勢盛之時，無可如何也。

其時，餘暇較多，撰述之時亦多，而中文系落實政策，乃將我之兩稿發還，我大喜過望，如死者之復活也。不久，我已患冠心病而不自知。至1973年3月，《探原》全部脫稿，約二百三十萬字，引用書籍凡八百二十種，共七十五大冊，重四十斤，歷時凡四十年。我即向中文系黨支部書記報告，請予指示，但久未得覆。同年4月，由上海出版社之編輯介紹於北京出版社，旋得彼社負責人覆函云，兩稿正是中華書局之分工範圍，並囑酌寄數冊審閱，因將兩稿寄去六冊，後接彼社負責人來函略謂：“羅先生的《源流》一稿，已由有關編輯同志看過，他們認為羅先生經過多年研究，寫成此書，足見功夫很深，很有成就。但是作為第一批讀者，他們建議將講音韻的一部分刪去。”此議，我院教研組同事並不同意。惟我急欲出版，祇有遷就照辦，再函詢彼社要否寄去，迄未得信。至《探原》一稿已隔兩年，彼社亦未作出決定，其時謠傳備戰甚急，我恐原稿散佚，不得已去函索回。遂又將原稿再校對修改一次，並編檢字與引用書

目錄各一冊。1975年9月，我又調任編纂《漢語大詞典》工作。1976年9月18日，上海市舉行追悼毛主席大會，我曾作古體詩一首，長四百餘字，張貼院內，觀者無不稱許。同年10月，我患大便秘大量出血，幾殆。是月，“四人幫”之首惡被逮捕，舉國歡騰，我輩遂獲二次解放。1977年11月，曾由老友吳文祺同志將兩稿介紹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至1978年6月，彼社覆函：“尊稿功力極深，至為欽佩，但以其中死字、僻字過多（按：函中所謂死字、僻字，都是最古的文字，拙稿旨在探原，自不得不研究之），甲骨文、金文更難描摹，從目前印刷條件來講，難以解決。現將原稿掛號寄上，請查收。”此兩稿在南北兩大文化中心之出版社均無能為力，其他可知矣。1977年12月，我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常務委員與主席團成員。1978年3月，日本東京都書道教員訪華團前來上海師範大學開交流會，我曾參加接待。席上我先以籀文寫“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大字，復又以隸書寫詩一首，詩用魯迅贈日本友人新居詩原韻，其句為：“一衣帶水望蓬萊，今日歌吟更勿哀。放眼縱觀新世界，五洲動蕩激風雷。”次年4月，上海與大阪舉辦書法交流會，先在上海，次在大阪，我曾以小篆寫毛主席詞句“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十字，參加展覽。1979年9月，我被任為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先是“四人幫”之首惡被逮捕後，來從我習文字學者有十餘人，其中有報刊編輯、大中學教師與業餘愛好者，奚柳芳即其一也。我之教文字學也，先講文字學之基本知識，講義以許慎之《說文解字叙》與五百四十部首為主，而以我所作之《說文解字探原自序》（以下簡稱《自序》）、《六書說》為輔。又以我所注之《說文解字叙》為參考資料。許叙先述我國之先期文字以八卦列結繩之先，講至此則以《自序》據《周易·繫辭》與孔安國《尚書序》所言，當以結繩列八卦之先。許叙次述文字製造之人為倉頡，講至此，又以《自序》據所分析古代文字之結構而言，則斷定我國文字產生之時當在原始社會末期；創造文字之人乃勞動人民，至階級社會，才是知識

分子。許叙次述六書之次序與意義，以“指事”列於首，又以“會意”列“形聲”之後，“假借”列“轉注”之後，講至此，則以《六書說》據文字發展規律而言，“指事”當列“象形”之後，“會意”當列“指事”之後，“假借”當列“會意”之後。許叙次述周、秦、漢之字體，常將古文、籀書、大篆混而為一，講至此，則以《自序》據考證現存各種字體之同異，當以商之甲骨文為古文，周之鐘鼎文為籀文，秦惠文後之詛楚文、盪和鐘、秦公簋、獵碣文（舊稱石鼓文）為大篆，秦始皇統一文字後之石刻、權量、詔版與許慎之《說文解字》均為小篆。許叙次則批評當時之荒謬言論，講至此，則述《自序》評議清代文字學家之得失及近代學人之奇談怪論，以便對照。至1979年，我院決定由我帶古文字學研究生兩名，9月上課。除研究生外，尚有各級選讀生五十餘人，大中學校教師與外地來滬進修之教師四十餘人，共九十餘人，前所未有也。第一學年我所講授者同上。第二學年，除繼續講授外，並指導研究生學習古代文字學專著與編寫《漢字源流》一書。第三學年，則以指導研究生撰寫論文矣。1980年8月，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各省市各民族參觀團，上海市任我為上海參觀團團長，先赴內蒙古、東北參觀，後赴北京參加國慶活動，10月14日返上海。

總我之一生，幼年即學書法，讀“四書”。稍長入中學，學英語及其他新學種。此外，又學金石詩詞繪畫。入大學後，又學商科等各項學科。此外，仍繼續自修舊日所學之文藝。少時即喜飲酒，愛古代音樂、昆曲，又好圍棋與內家拳術，所交遊者，皆海上名師也。又好遊歷名山大川，在大學時，曾往遊南京、蘇杭與普陀山；在就業後，曾往遊泰山、曲阜、故都（編者案：即北平）；在抗日戰爭時，曾往遊武夷、雁蕩；新中國成立後，曾往參觀安徽佛子嶺水庫，又隨各民族參觀團參觀北京、東北、湖北、河南各大城市之工廠、礦山、公社與水利建設。1978年5月，又往韶山、廬山、井岡山參觀學習；最近又往內蒙古、東北參觀，所獲其多。我有三子，長慶生，次胤生，皆工程師；次拯生，攝影師。有二女，長勵生，工程師；次敏生，